在反恐與神風之外—戰爭論述與科技社會

■郭文華

在九一一事件屆滿四周年之際，繁華一度的世貿大樓原址正積極規劃成爲紀念公園，飛機票上的反恐險、兵險成爲必備項目，而機場的各種安檢措施及簽證控管系統雖然繁瑣難行，但也已慢慢被大家所接受。

一連串的後續報導，包括支持蓋達組織（al-Qaeda）的伊拉克遭直搗黃龍、總統被俘受審、重行大選、或該組織的高層首腦在何時何處被搜捕擊斃等，似乎早把當時近在咫尺的威脅恐懼愈拉愈遠，淡化成在螢光幕上一晃即過的檔案照片、在遙遠大地移動閃爍的模糊身影，與記者乾淨平實的旁白解說。對許多台灣人來說，除了幾個零星事件外，反恐似乎早被埋葬在其他新聞下，成爲模糊的「戰爭」回憶與不知所以的紀念活動。

但我們好奇的是：戰爭眞的是理解這些活動的最好方式嗎？在此我們先暫且不論眾多學者對這波軍事與非軍事干預的解釋與評論，將這些行動定調成戰爭行爲的始作俑者，是九一一事件發生9天後布希總統對國會的公開報告。當攻擊來源大致確認後，蓋達組織成爲美國的宣戰標的。他宣稱自由之敵進犯金融中心，並造成上千市民的死亡，因此「對於如何贏得這場戰爭，我們要使出全力，動用一切外交、情資、法律與金融資源，掃蕩與摧毀全球恐怖網路。」

的確，冤有頭，債有主，宣戰要有對象。在報告中布希將他的決定對照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對日宣戰，因爲140年來只有她膽敢襲擊美國本土。而對美國人來說，這也是難忘的歷史經驗。不健忘的人應該會想起就在日本動用數百架飛機轟炸珍珠港，造成二千餘人死亡後的第2天，羅斯福總統在國會正式對日宣戰。他的開場名言：「昨天，1941年12月7日，這一天將活在恥辱之中。」不但是激勵人民面對戰爭的警語，也是開啓美日兩強在太平洋戰場正式交鋒的歷史宣示。

其實，不止是布希總統利用戰爭的論述將反恐與對日作戰聯繫起來，這兩個挑戰者的對抗策略在精神層面上也有不少相似處，其中最具體的大概就是有系統的自殺攻擊的使用。

從1983年希斯巴拉（Hisballah）組織在黎巴嫩展開自殺攻擊後，人身或汽車炸彈變成政治或宗教激烈組織向現代世界施壓的必備武器，在中東與世界各地都造成不少死傷。而在這個方向上，九一一事件的特出處就是「自殺飛機」的再現：讓受過飛行訓練的恐怖分子先挾持民用飛機，再以其做爲武器攻擊標的物。當然，操作這些工具的人是有去無回，必須與「敵人」同歸於盡。而在事後的相關報導中，我們也聽聞這些人視死如歸的說法。

以上都讓我們憶起太平洋戰爭末期神風特攻隊（kamikaze tokkotai）的往事。面對台灣沖繩戰役的敗北，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研判組織性戰鬥已無從取勝，日本本土也岌岌可危，所以提出以下奇襲方式：用滿載炸藥與抵達目的地所需油料的無武裝飛機，在友機掩護下欺進敵陣，衝撞敵艦與它同歸於盡。他的計畫看似瘋狂，但卻非全不可行。於是，在戰爭結束前海軍與陸軍各自成立特攻訓練學校與組織，從事各項攻擊與反空戰任務，死亡人數共超過3千人。但這些人也讓美國

吞下喪失26艘、受創164艘各式艦艇的苦果。

當然，這些自殺武器之所以能發揮奇效，其關鍵不是武器，而是對國家或組織全心效忠的操作者。以神風特攻隊隊員爲例，在一般人眼中他們是一群不惜犧牲生命以成就國家榮光的烈士。在照片中他們總是年輕、純眞、充滿熱情，而實際上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海軍特攻隊在18到24歲之間，有些甚至更年輕。而這些學生兵除了海軍飛行學校的正規生以外，不乏受良好教育，出身名門、名校的未來社會菁英，先自願從軍後加入特攻隊行列。

但在這些人的燦爛笑容後面，我們看不出他們的喜怒哀樂。或許因爲如此，美國大眾一直無法理解他們的「異常」行爲。比方說當時特攻隊長關行男大尉因爲幾次出任務都無法順利犧牲而懊惱不已，直到第4次才在雷特灣（Leyte Bay）海戰才得遂心願，捐軀報國。因此，就像對其他日本軍人一樣，他們認爲這些特攻隊員是因爲受到軍國主義的洗腦，所以才會盲目做出這種超乎常理的激烈行爲。

以上這段對軍國主義的理解可以在大西中將對特攻隊的命名得到印證。他以日本精神的象徵爲特攻隊命名，如「山櫻」、「敷島」、「大和」與「旭日」等。同時他也把出任務的飛機叫「櫻花」，運載的爆彈叫「櫻彈」，聲稱特攻任務如飄落的櫻花一般，是美的象徵。認爲特攻任務如飄落的櫻花一樣，是美的象徵。

其實，這樣的命名並非特例，將自殺武器與行動加以美化神風並非肇始者。在特攻隊成立之前，海軍早已研發各式各樣的自殺性武器，例如先前呂宋島戰役中已有所謂特攻快艇，在船頭放置炸藥來撞擊敵艦。此外它也投身自殺魚雷的開發，認爲若是有人駕駛魚雷，或可彌補其在性能與命中率上與歐美對手的差距。

而最不可思議的或許是所謂「人間機雷」計畫。這是針對美軍登陸所計劃的怪異兵器，利用潛沈在水底的操作員，手持附有水雷的竹竿，潛伏在敵軍登陸艇下方引爆水雷。雖然這種兵器實在過分簡陋，加上呼吸設備的技術問題，在訓練操作員時就已死傷累累，但它卻有個振奮的名字「伏龍」，就像它的魚雷伙伴「回天」（扭轉乾坤的意思）與快艇同志「震洋」一樣。這些武器的設計雖然千奇百怪，但出發點卻很一致：他們從未考慮在裡面操作的人是否樂意以這種方式報效國家。

這似乎是很奇特的軍備發展模式。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日本另闢蹊徑，以寶貴生命澆灌在這場荒謬的極限戰爭中，經由高度精神層面的誘導使人個性消失，以便整合進國家的戰爭工具中。以特攻機來說，即使是物資短缺狀況下所生產的克難機型，都有最美最精神的「橘花」與「劍」當作名字，讓人有瀟灑一去，從容就義的感覺。

但事實眞是如此嗎？在最近二、三十年出版的回憶錄與史料中，陸續揭開這頂壯烈的獻身美學帽子下，參加者從徵召參加訓練到任務前夕與絕筆時的反應，呈現出很不一樣的異質圖像。有些隊員並非自願入營，入營目標也是爲個人與家庭。一些人並不願意出毫無勝算的死亡任務，即使最後成行也不想掰個盡忠報國的理由。雖然軍

李男提供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除了幾個零星事件外，反恐似乎早被埋葬在其他新聞下，成為模糊的「戰爭」回憶與不知所以的紀念活動。

李男提供

以反恐來說，把它視為戰爭固然可以凝聚人心，讓軍事侵略師出有名，但顯然不是個好比喻。

隊講究長幼有序，但戰爭結束後特攻隊員俎殺長官的事件也時有所聞。更重要的是，犧牲者家屬並不是人人為這種行為感到驕傲。除開生離死別的苦痛與厭惡，錯愕的戰後指責更讓他們無法負荷。

當然，對照以上回憶與日本1997年在靖國神社所舉辦特攻隊特展的報國論述，我們固然可以很輕易說後者是國家的論述建構，或者是說泯滅個人，新一波軍國主義的精神基礎。但從科技與社會的角度，我們似乎該問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為什麼要用戰爭做為研究人與科技關係的切入角度？個人既然不見得為戰爭而活，自然其作為也不一定非得用戰爭（或好戰或厭戰）來了解。

比方說，最近一個特攻隊的研究初步發現這些自殺性武器雖然簡陋，但都附有「逃生設備」，如特攻機的漂浮裝置、特攻艇的安全設備與「人間魚雷」的逃生裝置等。這些設備甚至在一些人道國家，如當時的美國與英國都沒有配備。如果說這些工程師是戰爭機器的一環，他們又何必畫蛇添足地替這些裝置安上「無用」的設備？雖然這裡面還有許多技術細節值得探究，比方說當時的研發團隊、飛行機的標準規格、試驗的操作問題等，但這些顯然無法透過「非敵即友」的單向邏輯來理解。

或許，在批評軍國主義論述對人性的扭曲時，我們也必須對這些宣稱解構特攻隊神話的論述保持戒心。它們雖然滿足我們對歷史或這批人的好奇心，但或許會妨礙我們思考科技社會問題的本質。以反恐來說，把它視為戰爭固然可以凝聚人心，讓軍事侵略師出有名，但顯然不是個好比喻。

舉例來說，我們聽到部分恐怖分子「棄暗投明」並供出部分活動細節，但不知道這些究竟是事實，還是情資戰的一部分？在戰爭的制式論述下，個人不是在「正義」就是在「邪惡」的一方，而「個人見證」的揭露多少也是對立雙方各自拆解，詆毀敵對陣營的粗糙手段。但是，我們需要因此隨波逐流，認為這就是了解人與科技的唯一方式嗎？

或許我們該警醒的是：做為科技社會的主流比喻，戰爭不會就此停止。急就章並逕自宣稱了結的「反恐戰爭」，早有專家學者為文批評，但我們生活周遭仍充滿不少無人質疑的「戰爭」論述。

我們有抗煞（SARS）與禽流感的戰爭，有消滅貧窮、拯救婦女的戰爭，有爭民主爭自由、反極權反專制的戰爭。而就醫療來說，以「健康」為名，我們從控制傳染病到基因治療，從大規模預防接種到個人優生保健，戰爭比喻似乎無所不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論述中我們很少談到個人。他（她）們不是沒有面目的個體，隱身在疾病與科學的陣營中，就是被各陣營點名表揚，成為「英雄」、「義士」、「烈士」或「楷模」。

而書寫被這些制式論述忽略的個人，這個由醫療團隊與疾病交互蹂躪的殺戮戰場，為他（她）們奏出與科技共舞的人生樂章，大概是現階段我們所能做的「反戰爭」論述吧！ □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醫學科

更正啓事

本刊394期〈應隨機以恆周〉一文，第71頁右欄第 5 行，誤植4,517，應更正為4.517。